本版编辑：龚　克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难忘的延安岁月

□ 薛鑫良

2016年3月5日晚9时40分，凤凰卫视中文台在“皇牌大放送”栏目播放了专题纪录片《正月里·延安激情燃烧》。制作者们以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视野，既展示了八十多年来（1935年10月至2016年2月）的黄土风情，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延安儿女在不同时期的“精气神质”，那些山峁、沟壑和梯田、坝地，窑洞、土坑和小米、羊肉，秧歌、腰鼓和说书、信天游……把笔者的心绪又一次带回了黄土高原和延安岁月。

1969年2月9日至1992年5月15日，笔者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的志丹县（原保安县）、吴起县（原保安县吴起镇）插队劳动、工作和生活共二十三年多（曾任志丹县委副书记、吴起县委书记等职），对延安留下了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印象；同时，与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长征老红军刘明文（江西省吉安人）等老前辈情如师生、亲似家人。

一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华夏大地充满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文明与野蛮的诸多较量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了血与火、成与败、生与死的诸多劫难和洗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从1924年1月开始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半途而废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一年多时间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多人。共产党员数量从5.7万多人急剧减少至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并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侵占和吞并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施5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共约7000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九死一生”般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今延安市吴起县），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二

陕北早在1924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34年5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同年11月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担任主席（时年21岁，群众称“娃娃主席”）。

1935年9月，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不到两个月就抓捕、关押了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时任陕甘边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干部在内的三百多人（其中杀害二百多人。刘志丹于10月6日被捕入狱）。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周恩来在吴起镇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当机立断，指派王首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等人，策马赶赴关押地点——安定县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向西北保卫局传达和执行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1935年11月7日，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获释出狱。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曾经对笔者说过：“要是（如果）毛主席、周总理晚到几天，老刘他们就殁（没命）了！”习仲勋在建国以后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晚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马文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

1935年12月中旬，周恩来、毛泽东在瓦窑堡先后会见了刘志丹。不久，中央任命刘志丹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马文瑞担任陕北省委秘书长等职。

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经过卧薪尝胆、凤凰涅槃般的十三年，终于获得了“起死回生”、由弱转强的苦难辉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成为全党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一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目（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星火燎原的“东方魔力”；大西北的边陲小城延安，成为新中国的摇篮（始建于唐朝天宝年间的九层宝塔，成为象征中华民族“兴国之光”的“灯塔”）；以“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新风尚闻名中外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诗曰“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从各地投奔陕甘宁边区的各界人士共约25万人，还有海外华侨600多人、国际友人200多人；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黄金时期”。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的时候，人民军队已经从3万余人发展壮大到约240万人（另有民兵约300万人）；共产党员共约290万人。

三

1968年12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批又一批的大中学生，到山区、高原、牧区、乡村插队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

当时，延安地区共辖14个县，在12个县的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安置北京知识青年共2.6万多人。

习近平于1969年1月从北京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大队党支部的老书记梁玉明回忆说：当年梁家河一共有15个北京知青，近平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在这个穷山村待了七年，干了七年，做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还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到1975年10月才离开，回北京上大学。

1995年，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在接受媒体记者访谈时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培养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终生都要做报答老百姓的事！几年中，我过了四关：跳蚤（虱子）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我现在做工作反对搞花架子，就是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最反感形式主义。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时光。现在已经不容易培养那种在患难中形成的血肉感情了，这是令人深思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革命老前辈常以此来警醒，提醒我们决不做垮掉的一代；要做有志气的一代，做有作为的一代。从政的人，应该有远大目标，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做官首在做人，官品是人品的反映；做官、做事以做人为本，就能超越私欲干扰，为政不离宗旨。无论做大官，还是做小官，都要为老百姓办事。决不能做奸臣、做赃官。国家要兴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如果内争利于朝，外不能御侮，就要亡国。

四

2015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飞赴延安，一下飞机就转乘汽车，又一次回到梁家河村。他给乡亲们拜年；送上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参观了村史馆和苹果园；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并同每一家合影留念。

总书记又一次满怀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迈出人生第一步就来到梁家河。七年时间里，梁家河的父老乡亲给了我无数关爱，使我受益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

第三天，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以后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书不尽言，词不尽意。千山万水心有路，星移斗转情难忘。笔者仿佛又听到了延安的乡亲们那高亢激扬又深情厚意的信天游……

（作者系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原副书记）

永遇乐·拜谒井冈山

□ 唐　农

丙申季春，参加中央党校第40期中青一班赴井冈山体验式教学，是时杜鹃盈盈，长史澄照，文思萦怀……

莽莽罗霄，英雄啸歌，井冈山处。云峦合璧，哨口犹望，五指峰戚武。翠竹有情，杜鹃盈盈，应记当年角鼓。旌旗飞，炮声乍隆，战士杀敌如虎。

携思少长，次第踏来，峥嵘岁月回顾。谒大小井，行挑粮路，悼烈士无数。金瓯生辉，始于星火，抚膺自问能悟？幸福事，俯仰一生，信念永驻！

注：

1. 罗霄，罗霄山脉，井冈山在其中段。

2. 五指峰，井冈山主峰。

3. 少长，语出《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指访者甚众、年龄各异。

4. 大小井，地名，指井冈山的大井、小井，朱毛等当年旧居。

5. 始于星火，意取毛泽东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系中央党校第40期中青一班四支部学员、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说尊严

□ 宋惠昌

一个受过专业教育、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人，如果他没有文化素养或者说缺少基本的文化素养，仍然很难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这就是说，文化素养是人的尊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尊严就是一种文化。

什么是文化？作为人类学的概念，有这样一种定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复杂体，它主要是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等等，即文化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创造行为及其理性成果。这就是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所谓自然，不仅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相对立的外在自然；而且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原始性质等内在的自然而言。从而，所谓与这样的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性化，就是人类化。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由对“自然”即“野蛮”“原始”状态的否定，而形成的一种文明化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高层次的生活方式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够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很显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能不能保持着人的尊严，基本条件之一，是要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化。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肯定意义上、高层次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是一个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实质性内容，因而也是人的尊严状态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已经说过，正是人的主观中的自由意识和客观上的自由社会环境，造就了一个一个有尊严的人。文化是什么？就是人摆脱野蛮走向自由的实践过程。恩格斯说：“自由就在于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不过还要知道的是，作为文化的要素，自由与自觉二者是密切联系着的。就人的尊严这个问题而言，所谓自觉，就是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必须同样地尊重别人。常言道，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也可以叫做一种“文化自觉”吧，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为基础，才能说是真正具有了尊严意识。

这个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基础的文化，它是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公共场合中，有些人无所顾忌，随意破坏秩序，他们不尊重别人，却自鸣得意，殊不知，这首先是表明他们不尊重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即人们要使自己有尊严，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水平。这就意味着，要把那些有价值的知识，经过人生实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懂得人的宝贵价值，明白人是最高价值主体。如果是以这样的价值观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人们就会自觉地尊重别人，也能够尊重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说明，文化对于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文化使人成为人。这是文化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价值关系。对此，著名文化学者庞朴对文化概念下了如下的定义：“任何文化都是人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像人的一种行为和过程。文化追求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一个‘人’字。”可以印证我们的这个观点。

我们恰逢一个充满矛盾和多变的时代，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新观念新事物的层出不穷。我们每个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问题，都需要经常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需要我们迅速做出新的选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生活的激流中，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我们本真的自我，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我们具有一种大智慧——深厚的文化素养。

随　笔

学会“脱敏”读书

□ 赵　畅

前不久，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一篇读书文章，其中写到：读书要学会“脱敏”。

意思是在读书时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有意义、值得读的书去读，而不要被一些貌似“流行”“哄传”却缺乏价值甚至会误导读者的书所迷惑。

言及读书要精心选择，其实苏东坡也早有论及，他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时至今日，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据统计每年大约出版量在16万册以上，即便你每天都可以读完一本，你算算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读完？更何况，面对不断累积的书籍，我们若不加选择而只会步人后尘而读，行吗？

读书，数量很重要，但质量比数量更为要紧。没有质量的数量，读书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劳动，只意味着浪费时间。只要是有质量的读书，有时哪怕读得慢一点，少读几本，也是很管用的。想起自己读大学学习古代汉语时，主要是读《古文观止》，这是为学习古代汉语打基础的书，是“登堂入室”的不二选择。尽管因为过去这方面的基础较差，起初读得很是艰苦，也很是晦涩，但不耻下问、勤勉刻苦，一字一词地解读，一篇一篇地翻译，当整整一个学期将它“啃”下来以后，我的古汉语基础就比较扎实了，且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超越感。

选择读书，经典书籍，该是我们的首选。卡尔维诺在说到阅读经典书籍的“十四个理由”中就有“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每一个理由都让我们相信，读经典书籍我们肯定选择对了，因为说到底，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其意义就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难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儒学的钱穆先生，他一直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的《静思录》，以及王阳明的《传习录》。而正因为钱穆“认真阅读经典，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终令其不知不觉中学艺精进，尔后终成一代儒学大师。

坚持“脱敏”读书，我们还必须做到读自己原本“不敢读”的书。何谓“不敢读”的书？也就是那些难以读懂的书。这些书你不去读，或许你永远就读不懂，自然，书中的精彩你也无法观览，就如你登山看风景，你若不敢攀登悬崖峭壁，那么你就永远欣赏不到奇崛的风光一样。对待那些“不敢读”的书，就得有一种不甘心服输的精神，如此坚持不懈，渐渐地，总有一天，你能与之互动并驾驭它，成为它的主人。事实上，坚持读自己“不敢读”的书，还能引导你越界而读，因为许多你所读不懂的书，恰恰是因为这些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假若你知识欠缺、视野狭窄，于是，也就迫使你去开拓读书疆域。如钱钟书的《管锥编》，这是他于1960至1970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要读懂这书，你不越界而读、具备丰富的学养，行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世界读书日，灵感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美丽传说：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被困的公主，公主回赠给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是啊，智慧、胆识和力量，这便是书能带给你的。而“脱敏”读书，将帮助你更快更多更好获得智慧、胆识和力量。

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视角

——评《“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徐　娜

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的《“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6年2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长期致力于文化产业和文艺学美学研究，著述颇丰。《“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一书60余万字，计十一个部分，包括正文、绪论、附录、结语等部分。作者基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经验的双重视角，在书中既有宏观层面上对文化战略的独到见解、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也有中观层面上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理性思考、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剖析；还有微观层面上对文化产业风险特征的提炼与完善投融资体系的良策等。该书实现了宏观体系和局部细化可操作性相统一之效果。

范玉刚教授撰写本书所秉持的理念是相当明晰的：“在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定位文化产业”。作者提出“文化强国”既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呼唤，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在确立了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后，才迎来了文化产业的空前繁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重组，各种力量博弈的聚焦点。因而，在“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中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把握文化产业发展脉络，理清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明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可行性模式，探索其发展规律，是促进文化产业健康理性发展的一项迫切性工作。

本书内容丰富，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见解独特。作者基于对文化特征和文化地位不断凸显的深刻认识，对现实国情和当前文化发展现状的清醒判断，敏锐地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总结了文化产业的国际经验，对文化产业如何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做了回答，系统、深入且具现实意义。

振兴民族学术的爱国情怀。作者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突破和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指出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命运，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这样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令人感佩。

如果说文化强国战略是“取景框”，那么文化产业发展则是呈现在取景框中的风景。“文化如水，经济似船，政治是帆，水深载大船，风正一帆悬。”一如作者的授课风格，书中精当的比喻、独到的见解在给我们美的享受同时也带来理性思考。

（作者单位：天津市委党校）

书　评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